

第一章

延安审时度势乘虚而入
十万官兵捷足先登走出
山海关

1 苏军出兵东北，关东军遭惨败，日本乞降。延安和重庆万人大狂欢。大东北由谁来接管？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把眼光投向东北，却先在重庆谈判桌上发生交锋

打开一张中国全境地图，中国版图的形状活像一只大公鸡。公鸡的头部和颈部就是幅员辽阔、广袤数千里的山海关外的东北地区。这里土地肥沃、森林茂密、交通发达、工业基础雄厚，是一块宝地。

民国以来，这里是军阀张作霖的地盘。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，继位的张学良随即易帜，在东北悬挂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大旗。这标志着民国以来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。

然而，好景不长。日本侵略者于1931年9月发动了“九·一八”事变。由于国民党南京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，日本人很快侵略了东北广大地区，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。

中国共产党很快在东北组织了抗日义勇军。这支部队与东北人民一起，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。

1945年8月9日，苏联出兵东北。

苏联军队越过漫长的东北中苏边境线，密集的炮弹倾泻在日本关东军的阵地上。

苏军的坦克成群地向日军阵地猛扑过来，天空中苏军的远程轰炸机呼啸而过，在日军阵地上投下了一串串重磅炸弹。

东北大地在抖动着。

日本人被打得晕头转向，一个个地堡被掀开了盖子，很多日军士兵没来得及做任何抵抗，就血肉横飞，身首异处。

设在长春的日本关东军总部和伪满皇室人员乘火车纷纷南逃。

苏军兵分三路，长驱直入，迅速向东北各大城市进击。其中由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后贝加尔方面军以 8 个集团军、60 个师的兵力，一路由满洲里沿铁路线向南推进。由坦克组成的快速兵团一天前进了 150 公里，翻越东北大兴安岭，朝齐齐哈尔进军。一路由中蒙边境穿越广阔的大戈壁，两天推进 300 公里，进入东北平原，然后再向沈阳、长春等东北大城市进军，并很快占领了这些城市。

苏联出兵东北的部队，是攻占过德国柏林的精锐部队。他们的战斗力强，并擅长大兵团协同作战。

在苏军的猛烈攻击下，曾经骄横一时的日本关东军很快失去了抵抗力，伤亡惨重。日本军官纷纷剖腹自杀。

在苏联军队出兵东北的同时，美军于 8 月 9 日中午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，造成近七万人的伤亡。

在苏美军队和中国军队的联合打击下，日本军队已走投无路。

8 月 10 日，在裕仁天皇的授意下，日本政府向苏美英中四国发出乞降照会，这个消息通过无线电波很快传播到世界各地。

红色都城延安沸腾了！

大后方的重庆也沸腾了！

在延安，当天晚上，军民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。大街小巷，红旗招展，锣鼓喧天。人们欢呼跳跃着，把衣帽抛向空中，欢快地扭起了陕北秧歌舞。

在重庆，人们得知这一消息后，狂跑着，欢呼着。人们奔走相告。大街小巷，响起了噼噼啪啪的爆竹声。

重庆的《大公报》发表了题为《大时代展开了》的社论指出：

“大时代展开了！苏联大军已于昨晨开始行动，第二枚原子弹又于昨日下午降落于日本的长崎。打倒这最后一个帝国主义，人类就应该进入建设和平幸福的时代了！”

日本投降，中国艰难的八年抗战结束了。

苏军出兵东北和日本乞求投降的消息传来，使中国政坛上的国共两党都感到高兴和意外。

在延安，虽然有苏军情报组与毛泽东经常交换情报，他们只说过苏联一定会出兵帮助中国的消息，但具体计划和日期，则从未透露过。苏联出兵东北的消息，中共中央领导人如同老百姓一样，都是通过无线电广播获悉的。

从8月9日开始，延安开始充满了忙碌的气氛。

当天下午，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。

毛泽东在会议上谈到目前局势时指出：

“今天首先解决方针问题，我们的任务有四项：配合作战、制止内战、集中统一和国共谈判。我们要广泛发动对日寇的进攻，扩大力量，这关系到制止内战问题。我们的方针是取之敌伪，壮大自己，然后回头对付蒋介石的内战威胁。”

谈到今后的行动计划时，他指出：

“我们在绥远、察哈尔、热河、辽宁都有所准备 南方‘筑提’也已做了。当前要力争华北，力争太原和陇海路东段地区。时机不同了，这样做在战略上没有错误，不要怕冒险。”

当天，毛泽东还为中共中央起草了《关于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定》，随即发到全党。

8月10日和11日，周恩来起草了延安总部的第一号到第六号命令，并以朱德的名义命令各抗日根据地的部队前往敌占区接管受降 指示吕正操、张学思、万毅、李运昌、贺龙、聂荣臻等部分别向热河、察哈尔、辽宁、吉林等地进军。

8月10日，中共中央在致华中局的电报中，要求新四军采取

“重点主义”，集中主力占领津浦、沪宁两铁路线，并向长江以南的城市进军；要新四军军部即日发表江苏、浙江、安徽三个省的主席以及上海和南京两市市长的公告。

根据中央指示，华中局书记、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发表由粟裕和刘长胜分别任南京、上海两市市长的公告。

与此同时，八路军、新四军和各地方抗日武装分别向华北、华中和华南的城镇和交通要道的敌军发起了进攻，拉开了大反攻的序幕。

在重庆，蒋介石对抗战胜利局面的到来既喜又忧。喜的是抗战的胜利使他的威望达到了一生中的顶点。他不仅得到了英美的支持，苏联也与他的政府签订了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》，承认他的正统地位。

天时、人和的两个条件都让他占据了。但美中不足的是无地利优势。他的精锐部队远在中缅边境和云南、四川等地方。要把这些部队运送到华东、华北和东北等地，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办到。

更让他担忧的是，八路军、新四军一直在华北、华东的抗日前线，一迈开双腿就进入敌占区。而延安发出的一道道向日军反攻的命令，使他发急了。

8月11日，蒋介石连发了三道命令，无理地命令沦陷区伪军要“维持治安，保护人民，非经蒋委员长许可，不得擅自迁移驻地”；命令八路军“原地驻防待命”。

他声称：

“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，恪守盟邦协议之规定，各部队均勿擅自行动。”

八路军当然不会服从蒋介石的这些无理命令。8月13日，毛泽东起草了一份以朱德的名义给蒋介石的电报，义正词严地驳斥说：

“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，而且错得很厉害。使我们不得不向你

表示：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。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，不但不公道，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，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。”

同日，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演讲时，毛泽东针对蒋介石的无理命令，明确指出了党的“针锋相对，寸土必争”对策。

蒋介石还想出一个阻止共产党的军队向敌占区进攻的办法。这就是从 8 月 14 日开始，他连发三封电报给延安，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共商国事。

蒋介石的三封电报，的确给延安造成了舆论上的巨大压力。

正当这时，斯大林通过驻延安的情报组给毛泽东连发两封电报，其中大意是：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，如果打内战，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。尽管蒋介石想打内战消灭你们，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，如果一味拒绝，国内、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。

斯大林的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的极为不快，他气愤地对秘书兼翻译师哲说：

“我就不相信，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，民族就会灭亡？！”

然而，斯大林的态度虽然使人感到愤怒，但是却不能不认真对待。

当时国内外的形势都对蒋介石有利，而延安没有得到国际上哪一方的支持。

面对这一形势，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45 年 8 月 23 日召开了会议，商讨了应付形势的对策。

毛泽东在分析形势之后，说：

“这次谈判应该去，不能拖，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。只要我们站稳脚跟，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。”

会上就毛泽东是否去重庆谈判发生了争论。

朱德在会上发言说：

“和平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，这次去谈判是必要的。蒋介石可能作些让步。有无危险？看来比过去保险得多了。我们要保持军队，要保住人民已得到的胜利果实。”

他还说：“东三省我们一定要去，要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，也要派干部到国民党的后方去工作。还要准备把打仗作为重要的任务。”

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的结果是，周恩来先去重庆，毛泽东随后再去。

8月24日，毛泽东电复蒋介石：

“鄙人极愿与先生见面，商讨和平建国大计。俟飞机到，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，弟亦准备随时赴渝。晤教有期，特此奉复。”

8月25日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从重庆飞到延安的王若飞的汇报。王若飞当时是中共中央驻重庆的代表。

听取了汇报后，又经过反复权衡利弊，认为目前重庆方面的情况是人心思定，蒋介石虽然想吃掉共产党，但目前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大打。去重庆谈判，争取一段时间的和平，对根据地的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。

商量的结果，中央改变了原来的计划，让毛泽东、周恩来一起去重庆。

8月25日，来延安参加七大的刘伯承、邓小平、林彪、陈毅、陈赓、薄一波等20几位将领搭乘美军飞机返回各自的地区。

8月26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，讨论重庆谈判的问题。

毛泽东在会上宣布了他决心亲自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决定。

在谈到东北问题时，毛泽东指出：“陇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由我们占优势。东北行政大员由国民党派，我们去干部，一定有文章可做。”

会后，毛泽东起草了《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

通知》。

文件指出：“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，可能被挫败下去。如他们必欲内战，英美苏可能出面干涉。同时我党力量强大，有来犯者，只要好打，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（不要轻打，打则必胜），绝不要被反动派气势汹汹所吓倒。”

关于东北问题，文件指出：

“至于东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，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。我党能否派军队进去活动，现在还不能断定，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。中央决定派千余干部由林枫同志率领去东北；万毅同志所率军队，仍须进至热河边境待命。”

在完成了上述部署后，毛泽东又与刘少奇进行了彻夜长谈，面授机宜，分析了去重庆谈判后可能产生的各种情况，并研究了对策。

8月28日上午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若飞等在张治中将军、赫尔利大使的陪同下，乘飞机飞往重庆。

重庆谈判桌上，国共双方在军队的编制、政府方案上进行了讨价还价。

就在双方在重庆较量时，八路军、新四军的各路人马开始了向东北大进军的行动。

向东北进军，绝不是中共中央的临时决定和战略，而是毛泽东深谋远虑的设想。

早在1944年11月，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就说过：“中国的国土蒋介石丢到哪里，我们就到哪里。还要准备几千干部到满洲去。”

1945年5月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毛泽东又几次强调：

“要准备20到30个旅，15万到20万人，脱离军区，将来开到东北去。”

“东北四省极重要，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。有了东北四省，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。”

到同年 6 月 9 日选举中央委员会时，毛泽东还专门谈到东北说：

“东北是很重要的，从我们党的发展，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，东北是特别重要的。只要我们有了东北，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。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，因为我们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，没有大工业，没有重工业，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。”

毛泽东如此看重东北这块地方，是因为这个地区有丰富的资源和完整的工业体系。尤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在东北也没有统治的基础。这种情况下，谁捷足先登，谁就取得了打天下的主动权。

所以，在得到苏军出兵东北的消息后，毛泽东、朱德立即下达命令：冀东李运昌部、山东万毅部迅速向东北进军。

随后，中央组织在延安的干部，准备分批陆续派往东北。

2 失望的气氛笼罩着延安城，朱德鼓励说：“东北大有文章可做！”李运昌首先带兵进军东北。八路军和苏军联合攻占山海关。曾克林率兵进驻沈阳

正当中共中央准备往东北派去大批干部的时候，传来了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条约的消息。

这一消息对于在延安的干部们来说，好似当头被泼了一盆凉水，大家感到非常失望。

大家忧心忡忡，东北还去不去？能不能去？

8月28日在送走毛泽东后，朱德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为即将去东北的干部作报告，重申了中央的决心。

他态度坚定地说：

“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，东北大有文章可作。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在南方，到东北要走半年。即使他到了东北，顶多是他占城市，我占乡村。有同志这几天看到苏联和蒋介石订了条约，有些灰心。过去以为苏联会大大帮我们一手，现在失望了。这是因为过去希望过奢。但是要知道虽然有个条约，东北的工作还大得很。苏联三个月撤兵，中国要归中国人自己管，东北要归东北人管，我们当然可以管，条约上没有规定不要我们去，不要我们管。现在要派五万部队插过去，再派万把干部，将来还要去。这是很长远、很巩固的路。”

朱德的这番话，又重新鼓起了大家的信心。

实际上，东北究竟能不能去，中央此刻也没确定把握。

8月29日中央在给晋察冀、山东分局的指示中说：

“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，应迅速出发，部队可用东北军和义勇军等名义。只要（苏联）红军不坚决反对，我们即可非正式地进入东三省。不要声张，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。”

指示又说：

“进入东三省后，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，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，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和地方部队，大大地放手发展。在我军不能进入的大城市，亦须尽可能派干部去工作。对红军可进行非正式的接洽，将情报通知红军。但不要勉强与红军作正式的接洽与联络，亦不要请求红军给我们帮助。只要红军不作声，不坚决反对我之行动即好。但红军所坚决反对之事我必须照顾，不要使红军在外交法律上为难。”

这份指示还特别强调：“山东干部与部队，如能由海道进入东三省活动，则越快越好。”

接到中央的指示后，晋察冀和山东分局派遣先头部队，由陆路和海路向东北开始了最初的进军。

8月11日延安总部发布第二号命令后，冀热辽军分区立即在河北省丰润县大王庄举行紧急会议，讨论部队的部署问题。

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同志在会上传达了中央的命令。

李运昌是河北乐亭人，1925年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，同年入党的老党员。他曾参加过秋收起义，后来又在东北搞过地下工作，所以对东北十分熟悉。

接到中央的命令，李运昌和其他干部的心情都十分激动。

大家经过热烈讨论，决定成立以李运昌为书记的“东北前进工作委员会”，调动8个团、2个支队1万多人分三路出发。

当时，正值初秋。北方各地，正是雨季到来的时候。连日的阴雨，造成道路泥泞，河水猛涨。

日军和伪军仍然守在他们的据点里，等待国民党军队来接收。

冀热辽部队不与小据点的敌人纠缠，只是一直向既定目标前进。

部队一路到达承德，与苏军会师。

另一路到达平泉、赤峰。

由十六军分区曾克林、唐凯指挥的两个团和朝鲜支队 4000 余人，则向山海关进军。

这时山海关仍有日、伪军 2000 人驻守，拒绝向八路军投降。

山海关为东北进入内地的关口。明朝初年，驻守山海关的大将徐达把关口的城墙建得高大坚固，易守难攻。

八路军部队来到山海关边，他们只有枪没有炮，攻不下城关。

曾克林和其他干部决定先扫荡外围据点。8月30日早上，他们绕道出关，占领了前所车站，切断了山海关敌军的退路。

这时，正好苏联军队的汽车向这边开过来。

曾克林非常高兴，没等多久，苏军 60 多人分乘卡车，拖着三门炮，来到前所，与八路军会师了。

第一次与苏联红军见面，大家很高兴和激动。

曾克林带领大军拥上前去，热烈欢迎苏军官兵。

曾克林向苏军负责人作了自我介绍，并请求苏军配合进攻山海关。

苏联军官开始显得很犹豫。他们不了解这些部队是什么人，不敢贸然答应。

曾克林再三请求，苏军指挥官才同意与他们一起进攻山海关。

傍晚，苏军开始向山海关开炮。苏军步兵攻城的战术十分熟练。他们来回跑动，这边打打，那边攻攻。

曾克林则命令部队分头出击，攻占城楼。

日军和伪军实际上早已无心恋战，见八路军有苏军来助攻，形势不妙，便拔腿就跑。这样，山海关很快攻下来了。

曾克林马上向上级报告了这一消息，随后又带领部队沿铁路

向锦州前进。

9月4日，部队与驻锦州的苏军会合。曾克林决定留下1个团守卫锦州，带上4个连坐上火车，向沈阳前进。

这是八路军指战员们第一次乘火车。他们平时虽然走惯了羊肠小路，但毕竟还是感到坐火车又快又舒服，一个个兴高采烈。

第二天，部队到达沈阳车站，苏军守卫部队一看车上有这么多中国军人，不知是从哪里来的，神经顿时紧张起来，把住站台不许他们下车。

曾克林带人到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接头，遭到苏军司令的一顿责问：“你们是什么军队？从哪里来？谁叫你们来的？”

曾克林耐着性子向他解释说，我们是八路军的冀热辽部队，奉延安总部命令前来接收东北。

不料，这位司令仍是一口拒绝，将曾克林等赶回火车上。

曾克林来到火车上，与唐凯政委商量一阵后，决定以硬对硬。

他们又来到苏军司令部，唐凯见到苏军司令，把袖子一卷，露出胳膊上刺的五角星和镰刀、斧头标记，大声喊道：“共产党，毛泽东！”

一位苏军政工干部看出了门道，听曾克林、唐凯诉说了他们的来历和任务。毕竟大家都是共产党，苏军的态度缓和了，同意他们下车进入沈阳市区。

曾克林整顿队伍，大家穿上缴获来的日军黄军装，扛上枪，列队走在沈阳的大街上。

被日本人蹂躏和奴役了十几年的东北人民，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队伍。

他们以前不了解“八路”是怎么回事，只要是中国人来了，大家谁不高兴和欢迎呢！

大街小巷上，挤满了看热闹的男女老幼，不少人还跟着队伍行进，前呼后拥，好似节日大游行。

苏联军队看到这支队伍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，态度大为改变。两天后，苏军驻沈阳的最高领导人克拉夫钦科上将亲切会见曾克林和唐凯，称他们为同志，并答应给予配合。

曾克林得到苏军的支持，便在沈阳开始放手大干起来。

首先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，曾克林自任司令。

这时，沈阳市面上秩序还很混乱，大批日本军人和侨民等待遣返回国，中国老百姓在街道上与日本人相遇，举拳上去就打，发泄十几年来受的气。伪满的警察仍然在街上维持治安。苏军整天忙着搜集日本人在沈阳的财产，拆卸军工厂的机器设备，当作战利品装上火车，运回苏联国内。

大批工人失业，成了游荡街头的流民。

其次是进行扩充部队的工作。干部战士在街头一喊，马上就有成群的人来参加。不到十天功夫，曾克林的部队从不到千人迅速扩展到两万，真是惊人的速度。苏军把日本关东军在沈阳苏家屯的一座军火仓库交给他们看守，曾克林便下令开仓取枪。只要长着手，想拿多少拿多少。很快搬出 3 万支步枪，300 挺机枪和 100 多门炮。

这一下，又把苏军惹火了。

原来，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规定，东北的大城市都要交给国民党政府，不能交给八路军。苏军方面认为，允许曾克林部进入沈阳，已经很照顾了，没想到曾克林在沈阳咋咋呼呼大干起来，必定会刺激国民党方面和美、英等国，使苏联处于被动难堪的境地。于是苏军对曾克林下令，要赶他们走。

曾克林也不吃这一套，说我们也是奉命来的，你们要赶我们走是不行的，要延安中央下命令才行。苏方没有办法，便向苏军在东北的最高指挥官华西列夫斯基、马林诺夫斯基两位元帅报告。

在此之前，当苏军发起远东战役的时候，东北抗日联军的同志在周保中等率领下，分头担任苏军各部队的向导。

离开苏联进入东北之前，周保中等人收到斯大林的来电。电文说：

“东北是你们中国人民的东北，苏联红军的任务是解放东北，建设东北的任务是你们的。待命。”

大家接到斯大林的电报，受到极大鼓舞。

他们跟随苏军打回东北后，迅速分散成许多小组进驻到东北各地 57 个城市。苏方担任卫戍司令，抗联的人任副司令。为了便于开展工作，周保中化名黄绍元中校，任长春卫戍副司令。张寿箴化名李兆麟，任哈尔滨卫戍副司令。

周保中与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保持着密切联系。因为他们在苏联住了几年，被编入苏军序列，所以苏联人很信任他们。

周保中听说八路军到了沈阳，喜出望外，十分高兴和激动，立即指示在沈阳的冯仲云同志前去与曾克林联络。周保中向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请求接通与延安的联系。

这时，恰好部下来告曾克林的状，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感到确有必要与延安打交道，便派遣一位懂中文的贝鲁罗索夫（旧译名为：卫斯别夫）中校，与曾克林一起乘飞机前往延安。临行前，冯仲云将抗联给中共中央的信交给贝鲁罗索夫。

3 不速之客降落到延安，刘少奇在延安窑洞里举行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。彭真担任东北局书记。山海关苏军飞机失事，彭真和陈云遇险

曾克林和周保中在东北的上述行动，因联络困难，中央尚未得到报告。

根据中央的指示，山东军区下属的胶东军分区在 8 月下旬派遣邹大鹏、吕其恩等分别率领侦察小分队乘船渡海，前往东北。邹大鹏在庄河地区登陆，建立起接应联络地点。吕其恩到大连与苏军进行非正式接触。

苏军将领对他表示：红军只控制大城市，对八路军在乡村的活动，红军不干涉；也可以在城市里以非武装组织的形式活动。

邹大鹏、吕其恩在 9 月初返回胶东后，向山东军区汇报了以上情报。

中央在收到山东来电后，非常高兴，便于 9 月 11 日指示山东军区抽调 4 个师 12 团，约 3 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，并派肖华前去统一指挥。

指示还要求，部队进入东北一律不事声张，不用八路军名义，而用东北义勇军及东北其他地方军队名义，首先进驻乡村、小城市及红军尚未占领之中等城市和交通线，发动群众壮大力量，建立地方政权。

当得到哈尔滨的地下党组织寻求与中央恢复联络的消息时，